

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

唐晓峰

提 要 本文认为鬼方是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族群。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考古遗存可以证明这一点。自鬼族之后，战国匈奴出现之前，在山陕北部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骑马游牧民族。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遂以这种形式长期与晋南的农业区相对峙，其间出现比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地区与纯农区的分界线，即后来司马迁所说的龙门——碣石线。

关键词 鬼方 山陕北部 半农半牧

在传世早期文献上，关于鬼方的记载可举《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诗经·大雅》“覃及鬼方”，《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等。关于鬼方，后人多有注解。近世研究，早以王国维最著，其《鬼方昆夷獫狁考》以文献与铜器铭文互证，确定这一西北古老族群的存在。自王国维后，研究鬼方的学者日多。四十年代，王玉哲先生撰《鬼方考》一文，对王国维之说进行辩补，指出殷代鬼方应包有山西。由于卜辞中屡见“舌

• 本研究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资助项目（项目号 49831080）

方”，而鲜见“鬼方”，一些学者怀疑卜辞中工方即鬼方^①。但随卜辞材料刊行增多，“鬼方”在卜辞中之独立名称渐为人们承认。八十年代，王玉哲先生又作《鬼方考补证》^②，进一步讨论鬼方问题，强调卜辞中“舌”与“鬼”为不同族群。

在考订鬼族地望时，王国维曾举出以往数家看法，“有以为在北者，干宝《易》注云：鬼方，北方国也。有以为在西者，宋衷《世本》注云：鬼方，于汉则先零羌是也。有以为在南者，伪《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则以鬼方为荆以南之国。”^③ 总之，关于鬼族地望，书阙无征，古人众说纷纭。王国维于众说中，取《后汉书·西羌传》及章怀太子注引《竹书纪年》的说法：“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王国维称之为“真《纪年》之文”。王氏又结合大小《孟鼎》、《梁伯戈》等周器铭文，基本认为鬼族“其全境犹当环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东北”^④。

王国维所举《梁伯戈》残铭，乃记梁伯伐鬼方之事。《左传》桓公九年有“梁伯”同其他诸侯国共伐曲沃，梁伯之国在今韩城，临黄河。梁伯伐鬼方，说明鬼族活动范围已达到山陕间黄河地带。“鬼方”的整体范围究竟有多大的范围，不易确定，因为商人的“方”本来就不是一个表述确切的地域概念。但鬼方的一部或一支生活于山陕北部地区是没有问题的。鬼方的这一支对殷人、周人来说距离最近，很可能是殷周人心目中最主要的一支，从后来在晋西北发展的“媿国”、“怀姓九宗”可以说明这一点。学界基本认为“媿国”、

①代表说如董作宾《论古方即鬼方》，载其《殷历谱》下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63年。于省吾《释舌方》，载《双剑（谿）殷契骈枝》三编，自印本，1944年。

②载《考古》，1986年第10期。

③《鬼方昆夷獫狁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584—585页。

④《鬼方昆夷獫狁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586页。

“怀姓九宗”系出于鬼方^①。

鬼方在殷为强国,与殷为敌,殷曾大举伐鬼方。《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未济》:“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甲骨文中数见含有“鬼方(易)”的卜辞,以有祸为正卜,说明鬼方是商的直接敌人。武丁克鬼方后,商人势力得以稳定于西北,鬼方服属于商,直至商末^②。卜辞有“小臣鬼”(合 5577)、“王令鬼”(怀 1650)。《史记·殷本纪》:纣以西伯、鄂侯、九侯为三公。“九侯”,《集解》:“徐广曰:一作鬼侯”。鬼为殷“小臣”,纣封鬼族为公,说明殷代末期鬼族与殷的密切关系。周武王克商后,将叔虞封于唐,并与之“怀姓九宗”。“怀姓九宗”即“媿国”、“媿姓九宗”,与“九侯”、“鬼侯”同指一族。“媿国”、“媿姓”在周史上地位重要,曾与晋、毕、芮、郑通婚。传世带有“媿国”、“媿”字的铜器多件,据研究,多属于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③。《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集解》:“赤狄,媿姓”。以上“九侯”、“鬼侯”、“怀姓九宗”、“媿国”、“怀姓九族”、“赤狄”等均在晋西北之地。

根据文献材料与古文字材料,关于鬼族历史地理的基本情况,大体如上所述。而近几十年来在山陕北部所积累的考古工作成果,又为鬼方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线索。在鬼族活动地域范围内,即今晋中、晋北和陕西东北部的黄河两岸之高原山地,经常出土商代晚期铜器,多为墓葬遗物。根据这些铜器特有的风格,考古学者称之为“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其具体分布范围是:东起石楼—绥德,北至鄂尔多斯、忻县、保德、陕西府谷、神木、榆林,南到山西吉

①参见王国维《鬼方昆夷狁狁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陈公柔《说媿氏即怀姓九宗》,《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辑,中华书局,1989年。饶宗颐《甲骨文地名通检前言》,载饶宗颐主编、沈建华编辑:《甲骨文通检》第二辑,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参见林云《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

③参见陈公柔《说媿氏即怀姓九宗》,《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辑,中华书局,1989年。

县,西到陕西淳化。出铜器地点 30 多处,各类铜器累计数百件。从自然地理范围看,是以山陕交界的黄河两岸为中心,其最远扩及范围,北到鄂尔多斯,南达汾河下游以西洛河、泾河上游地区。西以子午岭为界,东部南端基本不过太岳山脉,北端则达淳沱河上游,而灵石往南沿着汾河则是它与另一些具有地方特征的晋南诸商代方国的交界线^①。

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可分为五期,最早的第一期年代为盘庚—小乙时期,最晚的第五期是帝乙、帝辛时期。这五期“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演化关系,无疑应属同一文化体系”^②。铜器可分 A、B、C 三组,A 组为殷墟常见器物,B 组是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的主要成分,肯定是当地所铸,C 组数量极少,风格受远北卡拉苏克文化(米努辛斯克盆地)影响。考古学者判定,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代表的是“与商文化并行发展、互为影响、长期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诸敌对方国的遗存^③。根据时代与地望,这个与商文化并行发展、互为影响、长期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方国,最有可能是鬼方。他们能铸造复杂的青铜器物,其文明程度相当可观。

1983 年,就在这个族群的活动地域内,考古学者又发掘了一座属于他们的古城遗址^④,时代为商周,上限不早于殷墟时期,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遗址在清涧县李家崖村西。无定河在李家崖

① 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载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67—189 页。


② 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载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70 页。

③ 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载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67 页。

④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 年 1 期。

村西蜿蜒流过,河东岸台地被河水切割成不规则的葫芦状,古城就坐落在“葫芦”上,东距黄河 4.5 公里。古城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 495 米,南北宽 122—213 米,城内面积 67000 平方米,仅东墙开有城门。城内发现有房屋、墓葬遗址。古城出土的陶器有鬲、簋、豆、甗、三足瓮、罐、盆、碗、勺纺轮等。石器和骨器有石斧、石刀、石凿、骨铲、骨锥、卜骨等。在一坑内出土有一石雕人像,系石板上以粗阴线条刻成,石板残高 42 厘米。石像出土时,坑口用十几块小石板围盖,雕像置于坑底,正面向下,很象是一处祭祀遗址。这座古城及多种遗物的发现,令我们对这个族群的文化内涵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对其文明程度更不敢低估。

据考古类型学分析,“李家崖古城址古文化因受并存的商、周文化的影响,在文化面貌上有一些商、周文化的因素,但自身的特点则占主导地位;它有一组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的类型品,在遗迹方面有不同于这时期其他古文化的自身风格和特点”^①。例如其 A 型鬲、簋、甗、三足瓮、小口折肩罐、盆等都是具有本地风格的器物。在石器上也是如此,其石斧一般为梯形短体,石刀断面呈“逗号”状,这种石刀在其他古文化中尚未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城墙下 1 号探方出土有一片三足瓮口沿,其上刻字作“鬼”,有学者释此字为“鬼”^②。甲骨文中“鬼”作,与三足瓮口沿上字写法大体一样。三足瓮刻字是否定论为“鬼”,虽需更多材料佐证,但其可能性是很大的。此三足瓮刻字的发现,为确定李家崖古城址的族属,提供了积极线索。如果此三足瓮刻字果然是“鬼”,则必是鬼族的自称、自刻,说明“鬼”不是商人发明的名字。“鬼方”对商人来说是借一族之名泛指一方,而李家崖古城的主人自称“鬼”,说明他们正是“鬼方”的主体。

①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 年 1 期,第 56 页。

② 吕智荣《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陶文考释》,《文博》,1987 年 3 期。

清涧李家崖古城遗址、遗物的发掘,为重新认识商周时期鬼方等北方戎族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对于今山陕北部商周时期的鬼方或“戎狄”,人们常常以后来的匈奴对之类比想象,笼统地以为他们也是居无常处的游牧族群。例如王国维称鬼方是“游牧之族,非有定居”^①,杨宽《西周史》:鬼方“以游牧、狩猎为主”^②。在通论性史书中,也习惯认为“北狄不管哪一部分,都过着狩猎畜牧经济为主的游牧生活”^③。现在看来,这些笼统的习见都是不准确的。它给人们一种错觉,好象古代北方被中原之人称为“戎”的古老民族,从来就是游牧民族。现在我们看到,“李家崖古城址中出土的石斧、石刀、骨铲等生产工具及繁多的陶质生活用器,反映出了该文化的农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经济生产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④。应当说,山陕地区商周时代的鬼方不是游牧民族,在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农业定居是主要的,只是畜养与狩猎占有一定比例,如出土有马、牛、羊、猪、狗、鹿的骨骼。全面准确地说,他们是一支半农半牧的民族。

如果向更早的时代追溯,今山陕北部高原地带曾普遍是发达的原始农业区。考古证据表明,比今山陕高原更加偏北的地带,即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其原始农业文化在距今 7000 年前已然出现,在此后至距今 4300 年期间的考古文化虽出现数次文化间断现象,但文化类型均为定居农业文化为主,兼营狩猎,而其晚期,农业文化已十分发达。根据考古资料,史前原始农业文化最盛时农业文化遗存北界的大致位置是:从大兴安岭西侧沿西拉木伦河北侧

① 《鬼方昆夷猃狁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586页。

②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页。

③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6页。

④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1期,第56页。

向西南延伸,至化德、商都,沿阴山南麓、大青山南麓至包头、乌拉特前旗,再向南经东胜以西,鄂托克旗、杭锦旗以东,向西经宁夏固原沿河西走廊北界至嘉峪关、玉门一线^①。

大约自 4000 年前开始,随着气候向干冷转变,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发生了原始农业衰退、早期畜牧业发展的演变过程,在原定居农业中,畜牧业渐渐扩展出来,在地区经济成分中比重开始变大。当然,这个过程不会是一个单纯笔直的过程,而必然存在曲折反复。目前,对这个曲折反复的过程还有待于精确度更高的研究,但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足以说明这个变化的大趋势^②。

需要注意的是,在山陕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这一农牧演变进程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可以说在这个地区最终产生了游牧经济形态,还有待于更多的材料证明。目前我们看到的有关山陕北部地区的材料,只能说明这里出现了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鬼族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说明距今约 3000 多年以前,今山陕北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大致为农业依然占有很大比例的半农半牧状态,不是“非有定居”的游牧社会。鬼族是可以知其名的最早的半农半牧族群。

在山陕北部地区,在商代鬼族之后,战国匈奴人兴起之前,这里是否存在过严格意义上的游牧民族,还需要仔细考察。两周时

-
- ① 参见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不同系统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及其影响》,载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93 年。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考古学报》,1997 年 2 期。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自然资源学报》,1999 年 3 期。
 - ② 参见田广金、史培军《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 年 2 期。史培军《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1991 年。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考古学报》,1997 年 2 期。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自然资源学报》,1999 年 3 期。

期,这里“戎”人四出,西周初年封叔虞要疆以“戎索”。《左传》昭十五年:“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国语·晋语二》:晋“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春秋之初,媿姓赤狄活动于秦晋之北并据太行上而建群国,势力很大,后向东、南扩张,灭邢、卫,侵扰中国。这些“戎狄之民”无疑是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群体,但不象是一个游牧群体,对其社会经济形态,不能简单地以后来匈奴的情形推之。《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军围鼓,鼓为白狄,“鼓人或请以城叛”。这说明戎狄有城。

一些对“北狄”进行仔细研究的学者虽曾明确指出狄人不是游牧族群^①,但仍不免把“农”的成分完全归因于南部华夏人的影响,而未能意识到本地久远的农业传统。如马长寿先生研究北狄之时,因考古材料尚不充分,而以为“春秋时的北狄部落,由于多年受黄河及渭水流域华夏诸族农业生产的影响,已经由游牧狩猎的生活变而为一种农牧的定居生活。”^②马长寿先生承认狄人是农牧结合文化,但仍推断其原本还是游牧狩猎的。现在,根据所知殷代鬼族的考古材料,我们意识到作为赤狄之先的鬼族并不是游牧人。那么鬼族之先人是否是游牧人?考虑到新石器时代北方大范围长时间的农业分布,在陕西北部地区农业沦灭而径直诞生游牧人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总之,我们在考察古代山陕北部地区因气候变化而导致农业衰退与牧业兴起时,对变化的程度还不能讲得太远,是否一直达到了可以定义为“游牧”的程度,尚需进一步从条件、环境等各方面考察。关于骑马游牧社会起源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假设颇多而材料甚少的状态,这里不容做过多讨论。

田广金、郭素新先生关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研究,内容包括了本文所强调的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即鬼族文化。虽然他们

① 如徐仲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遗稿),《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1期。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

②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8页。

将鄂尔多斯青铜器在总体上定义为“我国北方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①，但细读他们的研究，可以看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在不同时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骑马游牧所必需的马具，是春秋晚期出现的，那些具有浓郁草原游牧风格的动物咬斗饰牌，也滥觞于春秋时期并繁荣于战国时期。这些情况或许暗示了真正的骑马游牧民族——匈奴(或其先驱者)的逐渐登场与影响。而在此以前的时期，尤其是商、西周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工具和容器^②，我们再结合李家崖的陶器群来整体观察，商周时期的这个地区更不会是骑马游牧民族的地盘。

归纳来说，本文强调鬼族，或从考古学角度说是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李家崖古城所代表的文化，是一个半农半牧的社会群体。鬼族所生息活动的地域，代表的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块广袤的半农半牧地带，这个辽阔地带东起辽宁西至甘肃。在这个半农半牧地带的北面最早形成了单纯的骑马游牧社会，而半农半牧地带南面或东面则是纯粹的农业地带。千年之后的司马迁仍然看出在半农半牧地带与南方农业地带之间的界线，即《货殖列传》中所说的龙门—碣石线。这条界线的形成时间，至少不晚于“鬼方”存在的时间，也就是殷代。

在晋北及陕北地区古代强大半农半牧族群的存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理意义。半农半牧地带生活的人们与农业民族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动力。其表现是彼此敌对，但意义却不是相互破坏。德国社会学家弗兰茨·奥本海在《论国家》一书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纯粹农民居住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不易产生国家，如果“没有出现过来自外界，来自以其他方式谋生的

①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90页。

② 参见《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书187页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期表”。

人群的冲击”^①，国家则不会创立。张光直先生也强调过外部对抗推动国家形成的观点。晋南在远古时期即为农业族群与“以其他方式谋生的人群”对抗最直接、最尖锐、最持久的地区，所知我国第一个国家夏在这里诞生，或许与此有关联。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北京 100871〕

① 弗兰茨·奥本海《论国家》(沈蕴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页。

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1. Gui Fang: A Herder Husbandry Group of People in the Northern Shanxi and Shaanxi Region during the Shang-Zhou Period (by Tang Xiaofeng)

Gui Fang, a well known ethnic group in the northern Shanxi and Shaanxi during the Shang-Zhou period, was not a nomadic people as described in many books, but rather a group of herder husbandry or semi-nomadism.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re was a grea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t the northern Shanxi and Shaanxi during the times of 7000aBP — 4000aBP, and, since the climatic changes, some animal husbandry was developed, therefore, the society of the region became herder husbandry or semi-nomadism.

2. A Study on Settlement and Changes in Modern Agriculture of the Mongolian Nationality (by Wang Jian'ge)

With an evident characteristic of extensive management, the Mongolian nationality's farming was a kind of agriculture attached to pasturing before free cultivation was permitted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in both ecology and society in Mongolian area with free cultivation in Mongolian area and increasing pressure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living style, settlement is an important symbol. Movable yurts are changed into fixed ones or the Han nationality's mud-brick houses. Meantime, the Mongolian producing style also changed.

• 250 •